

让古装偶像剧陷入寒冬的是什么——评日前收官的《镜·双城》

►10版·影视

《开拍吧》：探索影视行业真人秀新趋向

►11版·文艺百家

藏在瓷枕中的虎年憧憬

在全国多个围绕老虎文物举办的展览中,虎枕成为标配展品

►12版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

展现平凡百姓生活史,描绘国家发展壮阔画卷

——关于长篇小说《人世间》的对话

对话嘉宾:梁晓声(茅盾文学奖得主、小说《人世间》作者) 王雪瑛(本报记者)

2022新春大剧《人世间》开播以来,创下CSM全网央视一套近三年来电视剧平均收视率新高。58集电视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梁晓声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。梁晓声以115万字的长卷塑造出百多个人物,书写了50年百姓生活史;电视剧以丰富生动的视听语言,展现了中国社会变革史,让观众从周家人身上的“小故事”,感受到改变中国的“大事件”,三线建设、上山下乡、恢复高考、知青返城、对外开放、出国潮、下海、国企改革、搞活经济、棚户区改造、反腐倡廉……《人世间》将时代糅进了人物的日常生活乃至命运转折中,环环相扣的矛盾冲突,家国统一的叙事方式,成功吸引了全年龄段观众,形成了全家追剧模式。

是什么触发了梁晓声的创作初心?让他调动丰厚的人生积累,真实的生命体验创作出饱含时代质感的恢弘长卷;作家孜孜以求的是叩问:生而普遍、命运平凡的人如何与“可敬”两字结伴而行。通过评论家与作家的深入对话,让读者更了解梁晓声的创作心路和观剧体验。

“我的家是一个相濡以沫、共克时艰的家”

王雪瑛:今年春节的“年味儿”很丰富,有春晚的笑声,餐桌上的乡情,冬奥会的兴奋,还有家人围看电视《人世间》的温馨。电视剧拍摄完成后,央视播出前您看过吗?现在您晚上也追剧吗?哪些剧情让您特别有触动?电视剧跟小说相比哪些方面有改动?

梁晓声:开播前,导演请我看过初剪片68集,我和导演也是朋友,他想听听我的意见“开剪”,主要是台词方面的意见。我也像审片员,每次记下来想法,向他汇报。由68集到58集,某些情节重新编辑了,所以现在我每晚也看,否则没有发言权。

我曾明确表态绝不干涉改编,故我没有看过一行剧本。原著中郝冬梅的父亲在那个动荡年代就去世了,他失去了复出工作的机会;秉昆也遇到过第三者,但不是孙赶超的妹妹;秉义那段北大荒岁月中,帮助处理“回城”事宜和人物关系与原著有所不同;原著中写周蓉的笔墨多,人物便更丰满,由她折射当年新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。须知,对于改编,我认为原著内容只不过是一堆建材而已,砖瓦石沙、水泥木料。导演是总建筑师设计师,编剧是绘图师,演员及全剧组是体现团队。原著是拼图结构,电视剧则要有主线,故改编难度甚大。体现下岗工人大群体命运的情节,更触动我一些。

王雪瑛:《人世间》以中国北方城市里的平民社区“光字片”周家三兄妹的人生轨迹为情节脉络,叙写了三代人的奋斗历程,展开了一幅以东北地区为基轴,以点带面的国家时代的变迁图景。您曾经说过:“我人生最大的不中意就是对父母歉疚。希望年轻人了解自己的父母、祖父母辈是从中国以往怎样的岁月过来的……”请说说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。

梁晓声:小说创作的初心源于我个人的情感。我父亲曾是大三线的工人,我小弟曾是酱油厂工人,我和我小弟下乡时,我们的哥哥患了精神病,这使我小弟的留城岁月比秉昆还难,他和他工友们的友谊正如“六小君子”。而我母亲当年将不少留城小青年认做了干儿子、干女儿,他们如今仍叫我二哥。父母、小弟都已去世,为这种民间至可宝贵的情愫留下文字记录,也是我创作的动因之一。

王雪瑛:人物塑造是长篇小说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,《人世间》是一部人物众多的宏阔长卷。周家父母与孩子的亲情和互爱,三兄妹的成长经历中,不是都有着您的真实人生经验和情感体验?您和“三兄妹”是同代人,熟悉他们的经历,理解他们的选择,请说说您的人物塑造与人生经验的关系,周家父的身上有着您成长中的影子?小说中哪个角色的塑造,让您感到尤为成功?

梁晓声:我的家是一个相濡以沫、共克时艰的家,手足之间很相爱,我们兄妹也很心疼父母。在原著中,哥哥秉义和姐姐周蓉对小弟秉昆也是很爱护的;但留城的小弟身上,反而家庭责任更集中,直接承受的压力也更大,这是没办法的事。我家的关系不像原著中呈现的那么复杂,但某一时期比周家的生活还艰难,两个弟弟,一个妹妹,三对夫妻中有五个下岗,没收入了,家中还有一个常年患精神病的哥哥,住房还都成问题,简直不敢回忆。幸而那时我还有些稿费,那是我靠一支笔扶养的十年,个中辛酸唯有自知。所以我写下工人生活,无需了解情况。秉昆身上有我是知青时的影子,便是义气。周蓉身上有我成为作家后的影子,便是清高。秉义身上有我写《人世间》时的影子,便是宠辱不惊,几无棱角了,只想与人生和平共处。蔡晓光是我更喜欢的人物,所以我让他成为后来的周蓉之护花使者。

“从作家的视角做好一名时代的书记员”

王雪瑛:《人世间》书写了几代中国人的命运与选择,描绘了一幅写实的众生相。您是共和国的同龄人,这部时间跨度长达50年的城市

百姓生活的长卷,应该充分调动了您的人生经验,也展示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生命力?

梁晓声:1977年我从复旦一毕业便分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。其后两年,编导室经常组织到电影资料馆观摩。从电影起点开始,我看了大量外国电影,所以我较早接触了电影的亦即文学的别种理念和流派。但我还是更喜欢现实主义这一风格,或曰更愿意创作现实题材。我不讳言,这种风格的坚持,的确源于“文以载道”理念。但今日之现实主义,其实已从别种流派那里借用了不少营养,故也是最明显的“拿来主义”。许多人认为现实主义便是反映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,这固然不错,却不全面。另一点是我后来悟到的,现实主义也必然要反映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,可以怎样,仅反映是怎样的,那是镜子的功能,而且因人而异,也许是凹凸镜。应该怎样,可以怎样,才使文学更成为文学。悟到这点,再重温名著,发现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车尔尼雪夫斯基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雨果、哈代、狄更斯们的作品都有那一主基调,《简爱》《红字》也有,而且不是人性之理想主义,而是现实主义“睽注”之眼的全面性。悟到这点对我后来的创作有启发;要是不兼顾此点,现实主义会是片面的主义。这些体会我在《人世间》的写作中有融汇。

王雪瑛:在这部现实题材的长篇中,您尤为关切的是什么?平民百姓间相濡以沫的真情,他们面对生活自强不息的坚韧,改变人生和命运的奋斗,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?

梁晓声:李路导演是有民间情怀的,民间是我和他、海玲同志相互交流时的一种说法,泛指最普通的大众。我们认为,在国家危难时期,他们中所产生的儿女一向能与国家共克时艰,若将年代前移至抗日时期,“光字片”中的大多数儿女,军工厂的大多数工人,都会是中国抗日的坚强后盾。周家儿女和他们的发小肯定会秉持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爱国精神同仇敌忾。若以后国家又有什么坎,他们仍会坚韧地与国家共同克服。进言之,大多数英烈并非希腊神话中那些神的子孙,而是民间的一些好儿女,成为党的高级干部的冬梅父母,马守常夫妇便产生于民间,秉义也是。和平时期,民间儿女很平凡,战争年代,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成为保卫国门的英勇战士。基于这样一种对于民间的认识,导演将向民间之坚韧精神致敬作为全剧的思想主旨,这一点在演员们身上都有体现,坚韧被他们诠释得很充分。

王雪瑛:每天追剧的观众看到了“人世间”生命力旺盛的人物群像,自强不息的周秉昆有着敢较真的执拗,重情义的乐群;成熟稳重的周秉义想方设法为工人、为百姓办实事;个性率真的周蓉自带理想主义的光芒和艺术气质;泼辣热情的春燕挥洒着敢取敢做的个性;身处逆境的郑娟磨着隐忍坚强的心理,散发着温柔细腻的性格魅力……李路导演将电视剧中几位主演称之为“四梁八柱”,您如何评价主演们对角色的理解、把握和演绎?他们演出了您心目中的形象吗?

梁晓声:我作为观众认为春燕夫妻、国庆和赶超夫妻,还有郑娟,光明虽非主角,也都表演得极出色,我们给他们打满分。他们各自虽有这样那样的性格缺点,但仅凭那种顽强旺盛的,并且尽量做好人的生存意志,也够得上了不起三个字了。他们都活出了几分绝不被困难所压倒的劲头,而这真是中国人宝贵的总体性格。全剧组将为普通的并不完美的人们立传为己任。

王雪瑛:虽然他们在“人世间”遭遇了生活的磨难,命运的坎坷,但在历史进程中奋斗成长,在曲折逆境中相濡以沫,他们有情有义的担当,善良正直的本色,传递着家的温暖,人性的光华,过好日子的信心和力量,吸引着不同年龄段观众沉浸其中。《人世间》让我们感到了文学抚慰人性力量的力量。您认为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?您40年来孜孜不倦的文学创作传递的是什么?

梁晓声:“文化天下”是中国文化的特征,这当然会使文化的责任甚大。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,长期以来,戏剧、小说也会肩负“化人”的义务,他们是各式各样的,但“化人”之一派,从未缺席。

我早已通过了通过小说来证明自己才华的年龄,何况我也没才华,并且也早就放弃了“秀深刻”的企图。世界已变平了,谁又比谁不深刻呢?故所以然,我只要要求自己尽量从作家的视角,做好一名时代的书记员罢了。要做好就得抓住点儿意义,即使别人都不信,自己也要信。我通过文学反复所传达的,无非这样一种叩问:在人性方面,人应该是怎样的,又可以是怎样的?尤其是生而普遍、命运平凡的人,其人生如何与“可敬”两字结伴而行。

王雪瑛:《人世间》营造出一种极富魅力的“史诗感”,在收获的众多好评中,“史诗感”成为高频词。作为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,您是如何理解“史诗感”的,“史诗感”也是您在《人世间》的创作中追求的吗?

梁晓声:“史”指年代感,“诗”指人之心性质地,两者结合,确乎是导演及其创作团队所追求的。最后要说的,我只不过是原著,电视剧《人世间》是央视、腾讯影业和新丽影业公司等倾情打造的项目,是导演及其创作团队努力完成的作品,我只不过是他们的付出的受益者,是他们的成功的欣赏者,分享者,如许多观众一样。



电视剧《人世间》剧照

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

——评电视剧《人世间》

任仲伦

这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故事,一个讲述成功的中国故事。

电视剧《人世间》成为虎年开年的收视焦点,因为它以满满的中国人情世故,触动了中国观众的心灵。作家梁晓声说:我想把从前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,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。原著者以文学语言叙述了中国父辈的故事。然后,我们在李路导演的电视剧《人世间》中,看到中国从苦难走向变革的半个世纪,看到颠簸于历史浪涛的百姓生活,历经悲欢离合。其实,它描写的不只是从前的中国,是从前延续至今的中国。

在中国社会走过的路标里,书写中国人的生活哲理和情感

《人世间》的成功源于尊重生活。这仿佛是老生常谈,但老生之所以常谈,因为它是真理。《人世间》叙述的是双重生活:一是中国的社会生活。中国当代社会生活波澜壮阔,少有小桥流水与田园平静;它总是深刻地影响着所有人的命运,少有人能超然度外、徜徉桃花源。《人世间》的故事从1969年展开,许多青年人的命运悄然扭转。接着,它依次表现了恢复高考、知青返城、国企改革、经商热潮、棚户区改建等重要社会事件。这些事件是中国社会走过的路标,构成当代社会史,也构成中国百姓命运史。中国社会是波涛汹涌的大海,每个人是颠簸于其间的小船,或者是一个不带动生圈的泳者,同呼吸共命运。二是个人的日常生活。社会生活背景是辽阔的,但编导紧紧聚焦于普通百姓的生活命运,没有戏剧化的强情节推动,更多是生活琐细的细节。一个东北的工人家庭,一群“光字片”的棚户区人们,一烟出火气扑鼻而来的百姓生活之剧,就此徐徐展开。比如开篇的第一集,周家面临着上山下乡的抉择。周秉义下乡离家,周蓉不辞而别,五口之家就此分处三省四地。父亲拿着洗印好的全家福照片说:“这或许是我们全家最后一张全家福了,难了!”社会生活是风,个人生活是草。风吹草动,即通过细致描写个人命运的“草动”,来折射时代生活的“风吹”,这是编导对中国百姓生活的理解,也是整部《人世间》的艺术逻辑。

电视剧《人世间》采用家庭叙事结构。家庭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微型标本,蕴藏着中国人的生活哲理和情感。你写好一家人,打动的是千家万户。周家的故事是全剧的叙述轴心,创作者放弃家庭人设的奇思异想,而是忠实于普通家庭的基本人设。父亲朴实而传统,对儿子严苛,对女儿宠爱。最后却让女儿踩痛了心,踩痛了也爱着,典型的中国父亲。母亲贤惠而顾家,大儿子周秉义有志向且能担当,二女儿周蓉义无反顾而柔情坚韧,小儿子周秉昆憨厚庸常却能竭尽孝心。这是中国人熟悉的家庭成员,就像左邻右舍,就像自己的家。虽然那个年代常常突出“我们”,但只要有人就有个人的生活欲望。即使是一个大家庭,彼此间冲突与吵架,成为生活的常态。周蓉的突然离家,让父亲心痛而绝望;周秉昆似乎是最庸常的,也是最敏感的,为了父亲的“虚荣”而顶撞;为了大哥的“薄情”而吵架。《人世间》把这种家庭人际冲突表现得真实而温暖,其价值核心就是中国家庭的人伦理想。

人伦思想不同于人本主义。西方的人本主义崇尚的是个性尊重与自由,中国的人伦理想更注重人际关系的和睦亲善、淳朴真挚。《人世间》中表现的父女情感、母子情感,甚至兄弟姐妹情感,洋溢着这种人伦亲情。尤其周秉昆虽然庸常,但有道义,敢于为朋友出头露面;有孝心,是母亲最可靠的依托,是家庭的顶梁柱,他温暖着所有观众。家和万事兴,就是中国人伦理想的最高表现,它让观众感同身受,感动不已。

那些具有旺盛艺术生命力的人物,平常背后见功力

观众喜欢看《人世间》,尤其喜欢看剧中的许多人物形象。比如周秉昆,比如郑娟,比如乔春燕等等,都为大家津津乐道。关于他们的议论远远超过了艺术创作范畴,延伸到生活的诸多方面,这是优秀作品溢出的社会效应。这些年,许多人阅读美国罗伯特·麦基的著作《故事》,然后得出结论:好作品就是好故事。其实,故事只是人物塑造的手段,“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展开史”,艺术创造的终极任务是塑造好的人物。所以说,经典艺术形象是衡量一个时代艺术成就的鲜明标志。同理,衡量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,关键是有无成功的艺术形象。

《人世间》成功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。父亲与母亲塑造得平常,就像每个观众的“俺爹俺娘”,平常的背后是功力。周秉昆最为大家喜闻乐见。普通观众始终对普通人物有着天然好感。周秉昆在周家孩子中算是最庸常的。他没有大哥二姐的智商,甚至没有他们的志向与勤奋,他更多是随遇而安。那次父亲带着全家四处拜年,并以大哥二姐是北大学生而有些洋洋得意,他的自尊心受到挫伤,也曾经愤怒过。但是,长期陪护病重的母亲,他无怨无悔。尤其与郑娟的相遇与相爱,更证明他是难得的好人:正直与善良。周秉昆低微但不卑微,苦难但不苦逼,他稀罕生活中任何一朵火苗,然后用它温暖彼此的喜悦。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,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。生活以痛吻我,我却报之以歌。因为他相信:好好生活,就是美好。

《人世间》中的女性群像各有其貌。郑娟是大家最怜爱的角色。同情是人们最愿意付出的情感。她几乎是苦难的化身,降落在尘埃之中,或者说,就是生活中的一颗尘埃。苦难是她生活的本色,她本能地去承认而不扭曲灵魂。“我不值得”,是她对自己的认识,也是对别人的提醒,她担忧拖累别人,但她绝不担忧拖累自己,尤其是面对周秉昆的情感。周秉昆与她第一次相遇,导演用镜头渲染出郑娟娇柔且惶恐,让周秉昆的保护欲砰然而出。随着剧情发展,周秉昆读懂了她的最内心:不为低微而屈从生活,却因为善良而牺牲自我,这是人性中最美丽的光芒。所以,他们彼此义无反顾。有观众评价:周秉昆与郑娟是《人世间》中最幸福的一对。我认同。幸福是幸福感,感受到的幸福才是真实的幸福。经济学之父亚当·斯密说:“人生中的苦难和混乱的最大来源,往往来自高估差别;贪欲会高估富裕和贫穷的差别,野心会高估高官和平民的差别。”周秉昆与郑娟彼此接受平凡,就获得某种幸福感。因为每当他们遇到困难与尴尬,彼此温暖眼神或紧紧拥抱,似乎就有了生活勇气。爱有时就是雪莲,单纯得不需要其他陪衬。郑冬梅是个“落难公主”,底层生活让她变得善解人意。当她的父母重新回到高官职位,她一如既往地爱着周秉义,在周家与娘家之间尽力平衡。周秉义告诉她:没有误会,只有差

距。差距是客观存在的。她相信:苟富贵,勿相忘。乔春燕是让人印象深刻的,一个浴室的洗脚工。她像北方夏天的风,又爽朗又温暖。她主动追求周秉昆,被几次拒绝却依然热情洋溢。善良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品质,宁肯牺牲自己,也不愿他人为自己牺牲。这种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,你可以不完全赞美,但你不能不感动。相比之下,周蓉有些别样。她有诗意冲动,也有生活主见。她认可好女儿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,只不过她认为,好的人生比好的年华更重要。为此,她追随诗人男友,其实是追随自我,即使最后遭遇背叛,自我依然是她不屈的梦想,有时却因抛弃亲情而遭到非议。自我有时会被认为自私。《人世间》这些人物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,无论你是否喜欢,他们都矗立在那里,以艺术应有的姿态。

在纷繁生活中找到真善美的光明,当是创作者的文化自觉

电视剧《人世间》的创作者是尊重生活的。他们不被奇思异想所驱动,而是虔诚地面对生活的原貌,真诚地塑造人物形象。他们相信艺术不一定高于生活,因为中国社会与个人生活蕴含着远比创作者更高更多的人生精彩。《人世间》剧本筹备历时三年之久,拍摄耗时六个月,场景设计与道具选择几近苛求,以期还原东北的历史场景与生活面貌。尊重生活不是自然主义记录生活,它需要创作者的洞察力。创作者的成熟度,来自于他对生活与人性的洞察与表达。《人世间》创作者是成功的。他们愿意搜寻日常生活中的内在本质,愿意移情到每一个人的内心,即使最隐秘的动机也不例外,然后以人物本来的逻辑,生动地描述生活与捕捉人性的声音,传递出对真善美崇拜的潜在价值观。电视剧《人世间》的成功,这是生活的胜利——你尊重生活,生活就给你无穷魅力;它也是艺术创造的胜利——你用心创作,观众就用心倾听。

值得指出的是,《人世间》的表演是十分出色的,这是群体性创造性的表演。它打破了靠大数据与流量统计来配置演员的迷信,它相信真正的艺术靠的就是艺术表演的实力。温暖现实主义,这是对近年来电视剧主流创作不断成功的理论表述。它意味着我们创作者即使表现现实生活的艰难甚至苦难,也积极给予观众以人性与人情的温暖。纯粹的光明与黑暗,同样看不清楚事物。我们总要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,优秀交织的人性中,找到真善美的光明。中国社会风雨兼程、波澜壮阔,诞生出人世间的悲歌与欢笑。所以,积极去表现中国百姓故事,应该是当下创作者与制作主体的文化自觉。记得在一次文化论坛上听到腾讯影业提出的制片方向:“关注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故事”,同时推出“时代旋律系列”创作计划。我们正在观看的电视剧《人世间》就是其中的成功实践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。曹雪芹当时不写《红楼梦》,后人何以能写出这《红楼梦》?巴尔扎克当时不写《人间喜剧》,后人谁能如此真实写出这部“法国社会编年史”?所以,当代创作者有责任将当代中国故事讲述好,把当代中国人塑造好。

(作者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)